

时代在越发开放与包容,许多东西的确需要重新去估量。当我们能够宽容曾经的许多反对过的,为何却不能宽容一个鲁迅呢?甚至,仅仅认为他“思想太深奥”而泼污水吧?

热点关注:鲁迅触动了谁的神经?

吕绍刚

最近一件比较热闹的事,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把鲁迅文章从5篇压缩为3篇,去掉了《药》和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日前,在上海召开的“2009鲁迅论坛”上,这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。

课程篇目微调,实属正常。新课改还在继续,今年加几篇,明年减几篇,高中减几篇,初中加几篇,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教材的审订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,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化历史的叙述、传承,绝不是通过媒体和民众投票能决定的。

但耐人寻味的是,近些年,媒体对于中学教材的改革保持着持续的兴趣。特别是关于鲁迅的“进”与“退”,争论不休。有的认为,鲁迅早就应该被赶出语文课本,有的则认为,削减鲁迅文章,是“数典忘祖”,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,无所谓。

人们对鲁迅的敏感,源于一种价值与立场的焦虑。鲁迅死后70多年来,一直是各方争夺的思想资源。有的认定的是一个革命的鲁迅,是反叛的破坏的,有的认定的是一个人间的鲁迅,是独立的自由的。

至于中间派,因为没有预设立场,往往只好左右摇摆,呈现出一个道听途说、拼凑嫁接且庸俗化的鲁迅。比如,要么听信前者,并机械地演绎,认为《药》结尾中,华小栓坟前树枝上的那只

乌鸦,是一只革命的乌鸦;要么听信后者,自作聪明地认为,鲁迅每天晚上爱用热水洗脚,那是因为他爱干净。

在什么时候,中间派总是占据大多数的。而且,以貌似各种主观客观的理由,唱衰鲁迅的声音,还是相当占上风的。比如,鲁迅文章不好读,过时了,比如鲁迅这个人太阴暗,流毒匪浅。

反对鲁迅的声音比较大,在很大程度上说明,作为符号化的鲁迅,已引起了许多人的审美疲劳。一些人迫不及待地骂鲁迅透骨,透露出对于民族、国家、历史、革命这些宏大叙述的极度厌倦。

鲁迅生前拒斥死后谶托知己,但显然不由他自主。人们还习惯以符号来说符号,以象征来说象征。其实,所有的争论,关鲁迅、关中学语文教学何事?归根结底是价值立场之争。

去意识形态,也是一种意识形态,只不过自觉不自觉地罢了。正如有人剔除鲁迅的革命性,说鲁迅很可爱,难道就一定还原了鲁迅了吗?不见得。毕竟,历史时空早已不一样,以此时的价值观去苛求、比附彼时的价值观,得到的是解构历史的快感,失去的却是历史的同情。

如今,今是非古的思想观念普遍流行,所以,许多历史的评价在不断折腾。与之同时,一批以

怀旧的、悲悯的、柔和地抚慰甚至抹杀历史的作品,十分盛行。

时代在越发开放与包容,许多东西的确需要重新去估量。当我们能够宽容曾经的许多反对过的,为何却不能宽容一个鲁迅呢?甚至,仅仅认为他“思想太深奥”而泼污水吧?

那些认为鲁迅的文章太深奥的人,显然是低估了高中生的思维素质。如果一个高中生承载不了那么一点历史感,那未免也太脆弱了。至于说鲁迅的文章,半文半白,不规范,这也很片面。鲁迅奠定了白话文的基准规范且不说,毕竟他是位个性分明的作家,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,供学生参考学习,很难说有什么坏处。

倒是鲁迅自己说,自己的文章有很多毒素,不愿意青年人来学习,自己的任务是肩住沉重的闸门,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。的确,鲁迅的文章是给人力量的,这个力量并不见得适合每个阶段的青少年,但是他的文章有的也是能给人温暖的,譬如《社戏》、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即使《药》是悲凉,即使阿Q是可悲的,但也是温暖的。

所以,选不选鲁迅的文章、选多选少都是个伪问题。至于所有的争论,都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过敏罢了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名片引发特权之嫌

两个月前,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苏锦梁家中的菲佣要继续留港工作,于是向香港入境处申请,按规定,雇主必须向入境处递交自己的纳税单、薪俸结算书、银行存款证明等文件,以表明自己有足够支付外籍佣工的工资。苏锦梁却交给那位菲佣一张自己的名片。入境处竟然也接纳以名片作雇主的一系列证明文件。有人将此事向香港传

媒爆料,结果引起社会一片哗然。香港人认为,这位官员有滥用政府高官特权之嫌。

入境处高层事后解释,只是以酌情权处理苏锦梁的申请,并没有不妥。这一荒谬解释更引起市民不满,不少市民讲述自己的经历,说入境处处理他们的申请时,对文件证明的要求极其严谨,稍有不足,就要一次次回家补救。入境处处理申请

肯定有酌情权,但为什么普通市民无法享受,副局长却能凭名片得到酌情权?这就违背人人平等的原则,运用酌情权的原则,不应该凭高官的名片来判断,否则就显示了高官凌驾规章制度之上。

香港政府多位官员坦言,这一事件给官员一个警钟,就是问责制官员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千万留神,绝对不能与自己的职权攀上任何关系,以免被指有利益冲突;政府部门在处理官员私人事务时,万万不能出现官员相护而放水的情况。

摘自《新民周刊》

香艳的经济指标

是有大量的数据和公式,要建立经济形势和女人身材、面孔之间的相关模型,得有些学术功底才行。

不过,还是有人能够发现新的方法。

2008年“五一”那天,《纽约时报》采访到这样一个例子:古典音乐作曲公司33岁的销售经理贝斯蒂,来到曼哈顿逛商场的时候,看上了一件标价为280美元的礼服,贝斯蒂认为价钱过高,在次贷危机阴影下不敢乱花钱,所以放弃了。不过,她还想更好地装扮自己,只好买了一支40美元的口红。

《纽约时报》举这个例子,是为了说明一个理论:口红理论。这个理论由商人莱昂纳多·劳德提出。他认为,经济形势较差的时候,女人更愿意买口红。所以,当“9·11事件”后,美国经济受到损害时,口红销量却出现了飙升。

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如何像格林斯潘一样预测经济趋势》,文章说,唇膏销量是经济健康程度的一个敏锐的衡量指标,有的人开玩笑,把它们说是雅诗兰黛主要经济指标。唇膏、唇线笔和唇彩的销量是反周期的,因为女人们在经济低迷时期选择买唇膏之类的便宜东西来振作自己,而不是花500美元买名牌鞋。当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,唇膏类产品的销量是最好的。

口红的销量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,除非你是百货公司老总,或者内衣公司的管理者。当然,还有更简单的测量方法,如头发长短以及裙边的长度。

头发、裙边隐藏的奥秘

1920年,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

经济学家乔治·泰勒就提出了一个观点:经济增长时,女人会穿短裙,因为要炫耀里面的丝袜;而当经济不景气时,女人买不起丝袜,只好把裙边放长。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,这一类理论多次得到了证实。不过,随着丝袜购买起来不那么困难,似乎裙边理论也不那么准确了。

日本人提出了头发理论。花王公司调查了过去20年来东京和大阪街道上的女性头发,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: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之前,20来岁年轻女性留过肩长发的达六成,但经济低迷后期,短发成为主流。自2002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和扩张后,长头发再度获得日本女性青睐。

从女人看经济,很香艳,也很惬意。有意思的是,这种生活化的、香艳的经济指标,尽管带有明显的局限性,未必能准确预测全局经济,却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,有时甚至能让你做生意更顺利。

比如,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,在早年当顾问的时候,需要了解市场和经济的景气程度,就专门把纸箱的使用量当成经济景气标准。他认为纸箱的主要功能是包装各式各样的商品,若纸箱的需求增加,经济活动也是有活力的。

其实,除了和女人相关的标准之外,攀登富士山的人群、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的数量、赴海外度假的人数、悲剧喜剧和恐怖片的流行程度、票房收入等,都被人们看做是衡量经济形势的标准。

敏锐的直觉,有的时候也不亚于几十页的枯燥数据。

摘自《宁波日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布什卸任后干啥

2009年4月30日,也就是白宫易主后的第100天,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搞了一个“总统生活大猜想”活动。猜想的主题是:卸任后的布什现在干啥?奖品为劳斯莱斯200EX一部,由eBay公司独家提供赞助。

面临巨额奖品的诱惑,全美上下可谓是绞尽脑汁,挖空心思。报纸发行后不到两小时,各种“猜想”就纷至沓来了:其中,一个叫詹姆斯的出版商写道,2001年,克林顿下野后,便着手写了一本《我的生活》。在书中,他调侃政治、大卖隐私,引得人们争相竞阅,他因此而狂赚一笔。所以,布什一定也在连夜赶写着书稿。詹姆斯还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,时代华纳公司早已捷足先登,独家买断了该书的版权。一位大学教员则认为,布什一定很想躲开喧嚣,以得到片刻的喘息。所以,他极有可能躺在夏威夷海滩享受着日光浴,或挥舞着高尔夫球杆,徜徉于旧金山的半月湾。还有的人猜测,布什肯定在多方联系技艺

超群的雕刻家,打算将自己的肖像凿进总统山,以供后世瞻仰。更有甚者,回答相当无厘头:布什在拉斯维加斯豪赌……

就在活动截止日期的前一晚,主编威廉·西奥多拆开了一封信。突然,他大跌眼镜。因为上面写着:在清理狗的粪便。落款是“贵报资深读者”。就是傻帽也知道,布什退休后,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了,但这种粗活儿也绝对用不着他亲自动手。况且,他好歹也坐过美利坚第一把交椅,要是被人看见了传出去多不好……想到这,西奥多感觉这是场无聊的恶作剧。“可恶的家伙!”他当即就将信揉成一团,并甩进了垃圾桶。

由于离任后的布什推却了一切采访,谁都不知道他真正地在做什么。所以,标准答案一直迟迟未得揭晓。这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片很大的呼声。面对舆论压力,西奥多渐渐地有点儿坐不住了。不过在一个月后,

“大猜想”终于尘埃落定。一切秘密尽在“资深读者”再次寄来的一盘录像带中。

这是布什看望佛罗里达州留守儿童的视频。“我养着一条纯种苏格蘭犬,它机智、勇敢、人见人爱,但就是有一点不好——随地大小便。所以,家里总是被它搞得一塌糊涂,每次总是我收拾烂摊子。还有每当逛街时,我不得不跟在它屁股后头,以随时收集落下的粪便……现在,我做着过去8年里一直不敢做的事。换句话说,我重获了自由!”当时,孤儿们被布什的一番话逗得“咯咯”大笑。视频快结束时,出现了一行字幕:饱经宦海沉浮和人生的大起大落,再回归于生命原本的宁静。现在,我想,布什终于体会到什么叫“无官一身轻”了。

最终,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公布了正确答案:在清理狗的粪便;并通知“资深读者”翌日前来卡爾福特大街北501号领取奖品。然而第二天,“资深读者”却没有如期而至。后来,据西奥多明察暗访后透露,这个“资深读者”正是沃克·布什本人!

摘自《博客》

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:英国议会关于滇缅公路的辩论、敦刻尔克大撤退、伦敦大空袭(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)、英德大空战……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消息的信使:诺曼底登陆、强渡莱茵河、进攻柏林、联合国成立、波茨坦会议、纽伦堡审判——每件大事,都被他赶上了。由此,《大公报》名声大振,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。

以上种种,是萧乾的运气,作为盟国文化界的代表,出版社约他写了四本英文书,电影公司约写剧本:作为文化界“援华会”的贵宾,去英国演讲,又成为威尔士等大作家的座上宾;诺曼底登陆后,作为战地记者,又与海明威、威尔逊等并肩作战。

1942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剑桥,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。为完成“英国心理派作家”论文,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丈夫弗列奥纳德·伍尔夫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,而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——大作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,今天哪个学生有如此荣幸?

1949年,萧乾谢绝剑桥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,回到北京,参加祖国建设。

摘自《资料卡片》

女儿让我的眼前五彩斑斓

于丹

漫。

有时候我领着女儿从幼儿园回家,在高楼的缝隙里偶尔看到月亮,她会欢天喜地大喊:妈妈,月亮!她的惊呼让我感动,因为我们现在没心思看月亮了,看了也不激动。她跳着说那个月亮是冰凉的,旁边的星星比月亮还要冷。但是太阳比它们热,就像她刚刚摸完这些东西一样。我想为什么她眼中的天空是不同的温度呢?孩子真是天才啊。

女儿对自然保持着一种敏感,人世间的事情她有时候会一语中的。有一天她很深沉地问我:妈妈,我知道全世界你最爱的人是我,可你是你第二爱的人是谁呢,是姥姥还是爸爸?我觉得我不能跟她说我都爱,那是糊弄小孩儿,必须艰难地选择一个答案。下了半天决心,出于教育的目的,我说是你姥姥。她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,我问为什么,她脱口而出的答案让我眼泪当时就出来了:因为我们三个原来是在一块儿的。她是剖腹产我也是剖腹产,她见过她姥姥肚子上的伤口,也见过我肚子上的伤口,她知道我原来是待在她姥姥的身体里,而她原来是待在我的身体里的,所以她说我们三个原来是在一块儿的。她当然

不觉得她是一个外人,我爱她是理所应当的,我们三个必须相亲相爱。

这是我想不到的答案,但是这个答案很高级,会直接给你一个人人与人之间、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。

很多事情她不懂,但她给出的答案比懂得的人更直接。奥运会期间有一次我带她坐飞机,她在机场跑来跑去,看见好多福娃做动作的宣传画,就用小手指着说这个是排球,这个是自行车,这个是乒乓球,这个是跳水,都说对了。但是她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(亲吻),不认得,回头看那么多大人看着,就大声地说,这个是打架。我赶紧告诉她打架不是一个奥运项目。我后来在电脑上查了一下专业术语,柔道、摔跤的统称叫对抗性竞技,是一种有规则的、比赛式的打架。

我女儿现在不到三岁半,她给了我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,她可以一语道破本质,她没有那么复杂的逻辑关系。简单有时候是真理,童言无忌,就是因为她没有受到那些工具的束缚。她会真诚地表达她的爱和善意,她保持着童话的想象,她改变了这个枯燥的世界,她在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加上了太多的惊喜,她使我的眼前五彩斑斓。我相信,如果你向孩子学习,能够唤起你自己的天真,让你活得明白、坦率,而且简单纯粹。

摘自《现代家庭报》

刚又去那个摊位远远观察,发现那个老大妈原来是个“托儿”。他说:“以后,再看见特老实、特忠厚的,一律绕道走。”

王刚出差去西安时,利用闲暇时间,到一家古玩店淘东西。这时已近黄昏,店里光线很暗。老板拿出一件古玩,对王刚说:“这是崇祯时代生产的青花莲子罐,请过目。”王刚一眼就看出不是真品,说:“请换一件。”老板说:“哎呀!先生真是行家,一眼就能识别真假,好眼力!”说得王刚有点儿飘飘然。老板又拿出另一件一模一样的罐子,王刚看了一会儿,说:“这才是真东西嘛!”老板说:“先生造诣很深,一定是古董专家。”王刚付了钱,老板一边收钱一边称赞。第二天,对着阳光细看,王刚发觉这个罐子是仿制的,只是比那个罐更像一些而已。王刚逢人就说:“少听奉承话,谨防上当哟!”

摘自《幽默与笑话》

留学英伦的文坛巨子

20世纪上半期,不少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负笈海外,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,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,在异乡求学打拼。

徐志摩: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

1921年春,徐志摩到剑桥国王学院,没有专修,是个随意选择听讲的特别生。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课,而住处竟然离剑桥六英里(近10公里)。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“谁都不认识”,连同学都没一个。而与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。无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夏,徐志摩却说“英国几乎是没有夏天的”。该年冬天,林徽因回国,而徐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,次年3月,他在柏林离婚,一个人回到剑桥。

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,徐志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。1922年3月归英,忽然发现“我这辈子就只那一个春”。他开始写诗了,于是中国有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。奇迹是怎么发生的?因为在“四五月间”剑桥的“春天是更荒谬得可爱”。徐的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,完全在描写乡野景

色,附加描写了剑桥上的古桥,完全没有说到文化学术。细读一下,就明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是:孤独。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意。“我在康桥的日子,可真幸福,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。”

这么一看,徐志摩确实不简单。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,但他对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;英国可能把老舍变成作家,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感。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的,真的只有徐志摩一人。

萧乾: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

伦敦大学东方学院(SOAS)中国部,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。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,年龄尚未三十,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。在这群星中,光彩不让前辈。

1939年,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。于当时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,因故不能再去,推荐萧去伦敦接任。当时二战正要爆发,《大公报》社长胡霖趁此机会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。于是萧乾